

贵州省情

《贵州省情》编辑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49—1984

贵州省情

《贵州省情》编辑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 帆
封面题字 倪祖林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夏顺利

贵 州 省 情

《贵州省情》编委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6开本 95.75印张 2,000千字 43插页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贵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

书号 17115·85 定价 24.80 元

《贵州省情》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何仁仲
副主编 谭忠信 邓国光
编 委 李 菁 常 征 张明新 王淑森 周邦华
安迪伟 龙兴洋 冯世明 宋汉年 刘学洙
何才华 毛希谦

《贵州省情》编辑室

主 任 邓国光 (兼)
副主任 唐玉芳 何 流 谢承宗 王俊英 张开友
综合编审 唐玉芳 何 流 王俊英

综合编辑一组

组 长 谢承宗
副组长 韦昌明
编 辑 肖自立 张文清 陈竹夫 饶光宪 郑 静 符晓钢
陈 建 邓昭远

综合编辑二组

组 长 张开友
副组长 周启中
编 辑 安玉宁 王钧明

概况部分编辑组

组 长 王干梅
副组长 陈永孝 熊书益
编 辑 雷云蕃 谢 一

经济部分编辑组

组 长 陈昭轩
副组长 肖自立 刘绍唐

编 辑 衣芸田 张妙高 康明中 沈斐宇

社会部分编辑组

组 长 张文清

副组长 张继泽

编 辑 熊永忠 龙昭毅 何光渝 罗 马 赵树民 施福根

地区部分编辑组

组 长 黎光素

副组长 陈竹夫 贺宗唐

编 辑 彭远森 肖永年 张净宗 陈永平 潘明达

附录部分编辑组

组 长 张开友 (兼)

副组长 郭亨隆

编 辑 陈集忍 王晓政 张安余

地 图

编 辑 聂长惠 张修福

作 者 王长发 樊 洁 潘万高 罗万伦 黄巍环 谢俊邦

田兴模 徐际鑫 吕希斌 袁家谟 陈 训 王家茂

周玉荣 吕玉斌

技术设计 杨初学 周汝昆 彭 干 张伟英

印制单位 贵州省第二测绘大队

彩色插页

图片编辑 陈 阵 符晓钢

图片版面设计 张幼农

标准计量审核 彭 勃 吴传忠

工作人员 徐 珊 魏淡如 李昌林 蒙东碧 苏 雯 戴尧臣

序

《贵州省情》出版了。这是参加编写工作的四百多位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贵州省情》，是第一部介绍贵州基本情况的、主要供决策参考的大型资料书。它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贵州的历史发展、自然地理、物产资源等基本情况；反映了解放三十五年来全省和各州、市、地、县（市、特区、市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历程、建设成就、当前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初步分析了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特点、优势和不利因素，并对发展趋势作了一些探索。虽然这些论述还不够完善，不尽准确，但是，它仍然能够为各级领导进行科学决策，为贵州的开放，为培养干部和推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为了全面开创贵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必须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从贵州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研究和制定符合贵州省情的发展战略和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工作方针。从贵州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看，什么时候我们的方针、政策比较符合省情，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什么时候我们的方针、政策脱离了省情，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就遭受挫折。这条历史的经验必须牢牢记取。因此，为着科学地研究、正确地制定全省的发展战略和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工作方针、政策，首要的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下苦功夫弄清省情。《贵州省情》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而编写出版的。

省情是一个由多要素、多层次组成的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的动态系统，对于省情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省情的研究不可能由少数人在短期内一次完成，而是需要全省上下各个方面长期探索，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的认识过程；而且这种认识还必须同全国的国情、全国整体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考虑。这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省情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贵州省情》的出版，只是反映了目前我们对贵州省情一个阶段性的认识。希望全省上下各方面，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深入地研究省情，把对省情、州（地）情、市情、县情的研究同具体的工作实践，同改进领导作风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工作方针、政策、措施和领导作风更加切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做好“因地制宜”这篇大文章，共同为促进贵州的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和城乡经济繁荣，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实现兴黔富民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胡锦涛

1986年5月

关于编写《贵州省情》的意见

编写《贵州省情》这部书，是池必卿、朱厚泽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时，省委作出的决定。必卿、厚泽同志对这部书的指导思想、成书特点、体例结构、编写方法以及组织领导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我们的编写工作有着指导作用。

编写《贵州省情》这部书的重要性，归纳起来，就是四个方面的需要：

一是实行科学决策的需要。过去，我们常常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谈论改进领导方法，提高领导水平，强调领导干部要到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等等，这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过去我们对各级领导的决策活动本身却很少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去加以研究和强调。决策活动主要地也是一种认识活动，从总的方面说也属于认识论的研究对象。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我们所坚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要求。对于经验，我们不但应该十分重视，而且还应该不断积累和进行科学的总结，使之上升为大家共同的精神财富。经验决策所以不足取，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缺乏或限制了表现决策本质的创造性。科学决策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使认识达到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能够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来制定和选择行动方案，充分体现决策本质的创造性。我们今天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只有凭借科学决策，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达到预想的目的。全省各级领导要真正实现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对省情、州（地）情、市情、县情有全面、系统、深刻的了解。如果对省情若明若暗，似知非知，只会造成决策的失误。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是比较多的。省委决定编写《贵州省情》这部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各级领导在制定全省以及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战略和工作方针、政策时，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

二是实行对外开放的需要。贵州要把闭塞状态从根本上打破，就要对全国开放，对国外开放。周恩来总理二十多年前曾经说过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这是对贵州省情基本特点最好的概括。这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着许多具体内容和细节。对这些情况，省外的同志和国外的人们都还很不了解，就连我们省内的许多同志也了解不够。我们说贵州矿产资源丰富，究竟有哪些矿产？蕴藏量各有多少？品位多高？有没有开采价值？要开采，又有哪些经济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都需要认

真加以查实。所以，我们要想从外面吸引资金、技术、人才来开发贵州，就必须向国内外提供既翔实又系统的省情资料，帮助国内的同志和国外的人们了解贵州，认识贵州，乐于为贵州的开发和建设提供各种方式的帮助。

三是培训干部的需要。编写《贵州省情》这样一部客观地反映贵州情况的书，有助于全省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了解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掌握省情的基本特点，认识本省同全国整体发展需要的联系；促使全省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牢固地树立实事求是的观点、全局的观点、商品经济的观点、技术进步的观点和增强历史责任感，从而提高我们干部的素质。因此，建议我们的各级党校，甚至高等院校，今后可以开这么一门课，就叫“贵州省情”。编写好这部书，就可以为我们培训干部提供一部辅助教材。

四是推进研究工作的需要。振兴贵州，促进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科学研究。而目前进行这样的研究，还缺乏完备的省情资料。《贵州省情》这部大型的综合性资料书的编写，不仅本身就是一个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而且它的完成，又为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基础材料。

如何编写好《贵州省情》这部书，使这部书能够适应上述四个方面的需要呢？

第一，务必讲求科学性。要使《贵州省情》这部书能够作为各级领导决策的重要依据，在成书的指导思想方面，讲求科学性是第一位的。讲求科学性，就是对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现状、未来的描述，必须实事求是。应当用联系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反映贵州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发展过程，描述它们的发展现状，探索它们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而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去反映。既要对各方面的优势作出准确的、客观的估量，又要清醒地看到劣势和制约因素，还要探索如何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优势的途径。我们强调讲求科学性，还有一点，就是这部书不应当只是纯客观地提供一些资料，不应当是简单的资料堆积，而是要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一些分析、整理，对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作一些纵横比较，作一些科学的概括，提出一些比较科学的论断。

第二，力求保证全书具有较强的系统性。贵州省作为全国经济社会活动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我们编写《贵州省情》这部书，应当把它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对待。它不仅应当反映自然、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而且还必须从历史、现状、未来的角度和从部门、行业、地区的角度来反映。这些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所反映的情况，还应当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同时，所反映的情况不仅应当摆脱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局限，坚持立足于全省，而且还要反映出贵州与省外、国外的联系。总之，全书在分类、篇章结构、章节内容的安排上，都要体现系统的内部联系。为了保证《贵州省情》这部书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编委会几经研究，提出了一个编写大纲，希望各撰稿单位要按照编写大纲的要求来统一思想认识，承担各自的写作任务，不能够各行其是。

第三，注意依靠集体的智慧。编写《贵州省情》这部书，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就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来说，应该是领导同志、专家、撰稿人员、编辑人员的几结合，不能只交给几个撰稿人关着门去写。从这部书的整体来说，就是要依靠编委会和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总之，这部书应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并不排除个人的智慧，而是要求个人的智慧与集体的智慧融合在一起，要求充分发挥各方面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书稿的编写，有个探讨的过程，对于一些看法不一致的问题，可以而且应当展开讨论，希望大家抱着追求真理的态度，携起手来，共同把编写工作搞好。

第四，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这就要求全书体制统一，结构严谨，内容翔实，数字准确，说理精当，文字、数据、图表、照片等的使用符合规范化要求。这些，都要求我们的编写人员在编写过程中始终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最后，希望参加《贵州省情》一书编写工作的全体同志，为了贵州的开发、开放和振兴，为了贵州三千万人民的尽快富裕，为了祖国的富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饱满的热情，在编委会统一安排下，抓紧时间，努力工作，使《贵州省情》这部书及早问世！

丁建模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

• 编辑说明 •

《贵州省情》是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并领导编写的一部全面反映贵州自然地理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特点的大型综合性书籍。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采取系统的方法，运用全局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设计和编写的，在内容结构上重点反映贵州三十五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和巨大成就，突出分析了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和趋势，力图为各级领导实行科学决策、为贵州的对外开放、为培训干部和科学研究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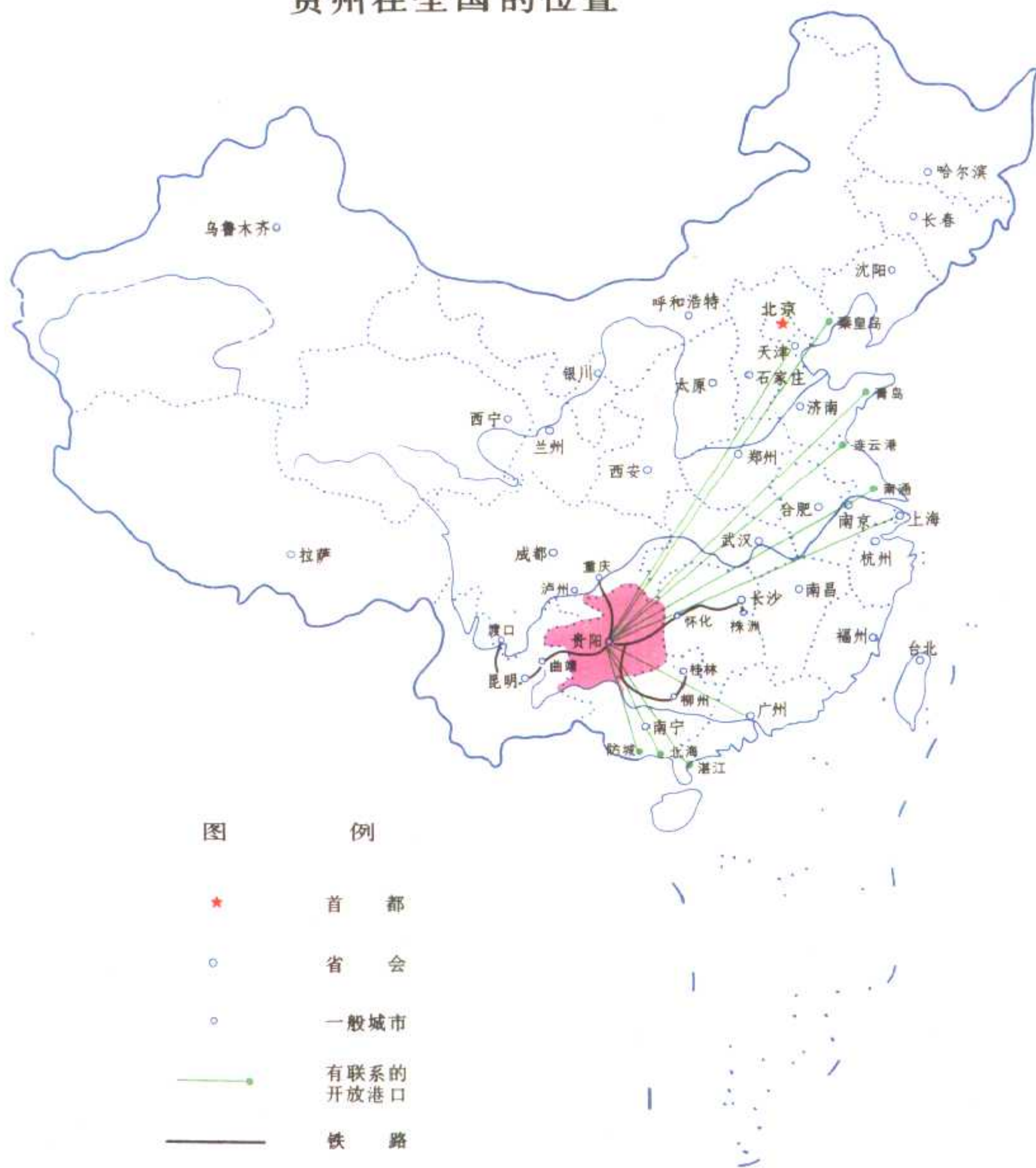
《贵州省情》的编写，是由《贵州省情》编委会统一制定大纲，由各州、市、地和省直各部门具体承担写作任务，最后由《贵州省情》编辑室统一组织审稿和编纂的。各篇章的编写均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成书要求，采取单位领导、专家、作者、编辑四结合办法拟定写作提纲、论证书稿，党委（党组）审查定稿，《贵州省情》编辑室统一编审，撰稿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复审，主编签发的程序进行的。因此，各篇章的内容结构既有统一的要求，保持了全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同时又照顾到各州、市、地及省直各部门的特殊性，注意突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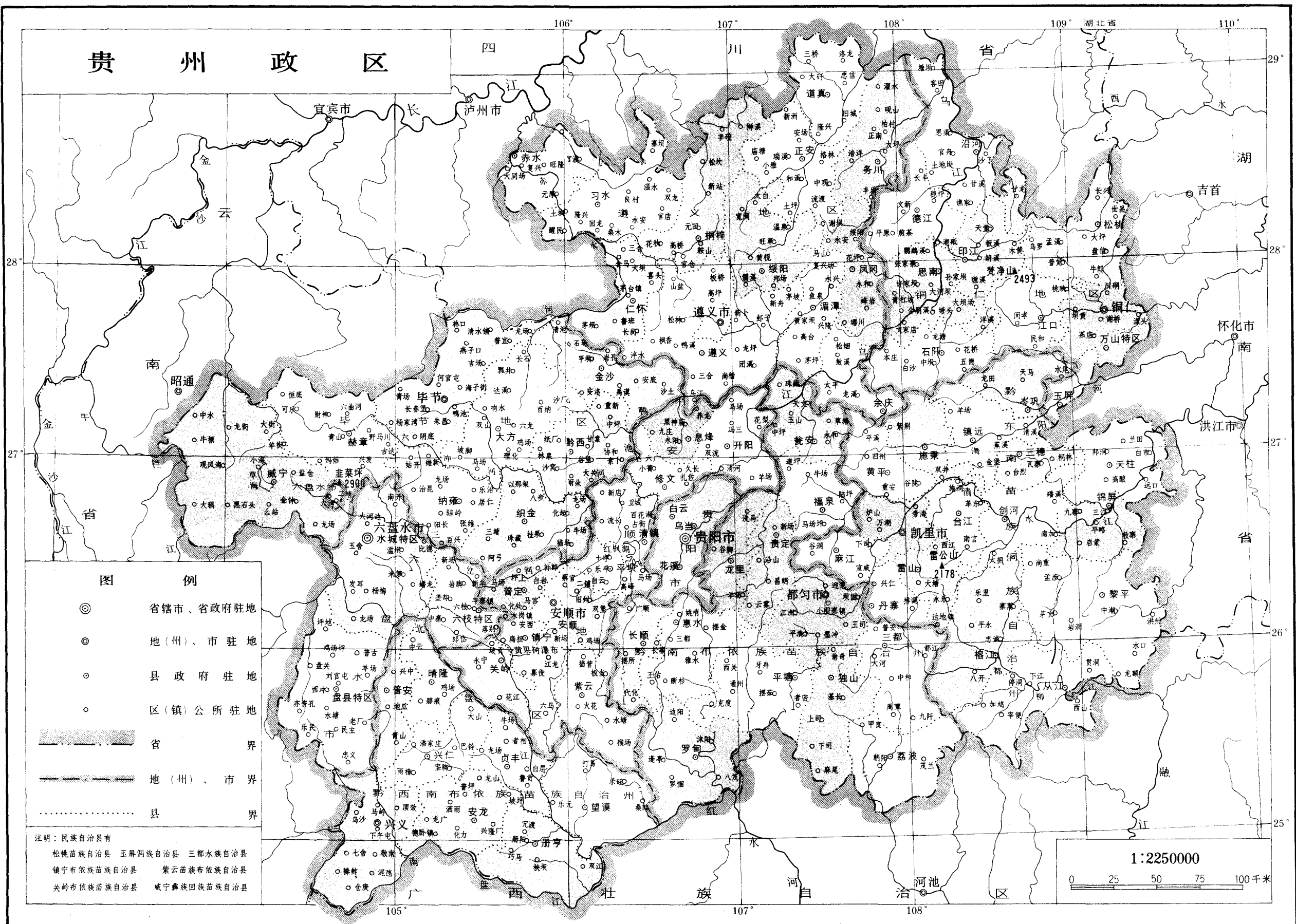
为确保全书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书所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是由省和各州、市、地统计部门提供的。各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资料也都经过统计部门核实认可。对某些数据，由于资料来源和口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我们也作了相应处理或加了注解。

《贵州省情》的出版，只是反映了目前我们对省情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识。虽然我们的主观愿望是要实事求是地反映贵州的基本情况，力求揭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以达到省委提出的成书要求，但由于省情是一个由多要素、多层次组成的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的动态系统，对省情的认识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而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一次完成，还有待不断深化。加上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时间紧迫，所以，我们对省情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可能不够准确，甚至有疏漏和错误的地方，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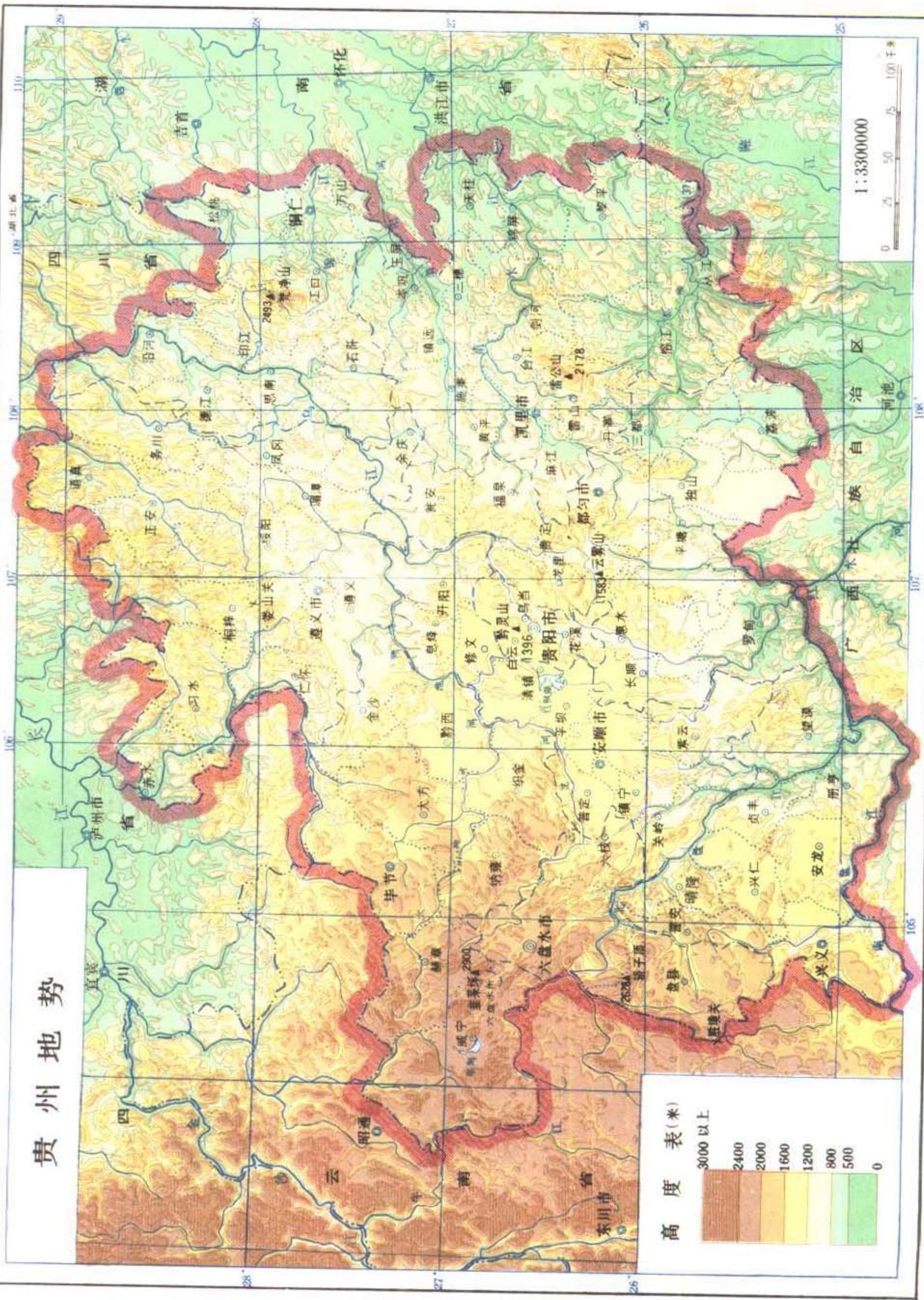
本书的集成，是全省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和全体作者、编者共同努力的成果，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许多部门和单位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协助。省委研究室抽调了近一半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具体地承担了本书的设计、组织、协调和编审工作，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省委办公厅在行文指导、财务管理、车辆安排和

贵州在全国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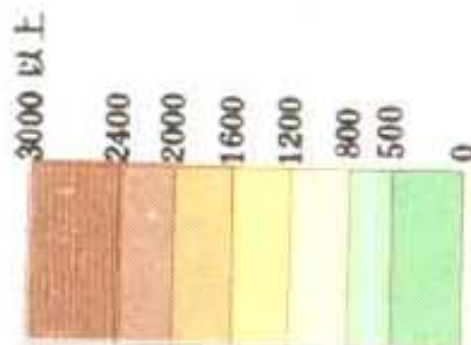




贵州地势



高度表(米)



1:3300000

0 25 50 75 100 千米

亲切的关怀



1
2
3

1. 1960年4月，周恩来同志到贵州视察，亲切勉励全省各族人民：“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只要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那么，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大有希望。”（《贵州日报》社供稿）

2. 朱德同志曾两次到贵州视察工作，这是1960年3月朱德同志到贵州视察时参观贵州博物馆。 孙烽鸣摄

3. 1959年10月，董必武同志到贵州视察。这是董必武同志参观《贵州十年经济建设成就展览》的矿产资源部分。参观后，董必武同志欣然题词：“斩棘披荆辟坦途，十年生聚有规模。若论地下资源富，天府名应属此区。”

王正雄 摄



邓小平同志曾两次亲临
贵州视察工作，这是1958年
11月邓小平同志到贵州视察
时的情景。 南沙 摄



1984年1月，胡耀邦同
志到贵州视察。这是胡耀邦
同志在听取省委负责同志的
汇报。 王正雄 摄



1985年3月，李先念同志到贵州视察。图为李先念同志在乌江渡电站听取有关同志的汇报。



1984年3月，赵紫阳同志到贵州视察。这是赵紫阳同志参观贵州铝厂。彭邦卿摄